

以文化交涉视野考察近代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史学互动

——以重野安繹《大日本维新史》与内藤湖南《章实斋先生年谱》为例

陶 德民

近代中国的史学变革究竟受到了欧美和日本的哪些影响，这些影响又是如何被接纳、拒斥或者创造性地转换的呢？检讨这一重要课题，“文化交涉学”的研究方法也许能提供一个有效的路径。此方法由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中心（2007～2012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全球化卓越中心项目）所研发和提倡，旨在探索人物、书籍和事情的真相和来龙去脉，考察介入其中的多元文化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加以动态分析和综合把握。

在近代中国的史学界，确实有不少日本学者的著作和译著发生过影响，而其中重野安繹《大日本维新史》（1899）和内藤湖南《章实斋先生年谱》（1920《支那学》第三，四号连载）留下了较为显著的印记。前者于1900年1月19日被赠与湖南的大儒王先谦（1842-1917），解决了其燃眉之急，使之据以写成其名著《日本源流考》（1902）的近代部分，并得以将迟迟未能出版的全书付印。此事直到近年才被狭间直树、大里浩秋和刘岳兵的研究所坐实（刘著《近代中日思想文化交涉史研究》2019；白春岩监译的日文版2025）。后者即《章实斋先生年谱》竟然首先出自日本人之手，胡适感到“最可使我们惭愧”，便化一年功夫编撰出版了字数多出数十倍的同名年谱（1922），在寄送内藤时还在封面上题词“敬赠内藤先生 表示敬礼与谢意”。张尔田则在1930年收到自己供稿的《内藤博士颂寿纪念 史学论丛》后回信，赞扬内藤“博采兼收”钱大昕和戴震等乾嘉诸家，学问比章学诚“更精更大”。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重野和内藤之所以能将自己的影响播及中国，绝非偶然。作为近代日本的大史学家，两人皆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怀有将日本、中国和西方的优良史学传统发扬光大的抱负。我在以近世怀德堂的学问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怀德堂朱子学的研究》（1994）出版前就开始研究1916年在大阪重建了近代怀德堂的西村天因（1865-1924），他既是重野的同乡和门生，也是内藤任职朝日新闻社和京都帝国大学时的同事，结果发现这三人构成了日本近代汉学史的一个重要脉络，在继承考证学传统，接受桐城派文论以及提倡对华亲善外交方面均有可圈可点之处，于是先后出版了《明治的汉学家与中国——安繹·天因·湖南的外交论策》（2007），《重野安繹的外交·汉文与国史——大阪大学懷德堂文庫西村天因旧藏写本三種》（2015），『日本近代中国学的形成——汉学革新与文化交涉』（2017，辜承尧翻译的中文版获得第十届孙平化日本学学术奖译著类三等奖）等。三者关系的密切程度可以从重野的传记由西村编成，碑文（小牧昌業撰文）由内藤书写，西村的墓志铭由内藤撰文并书写等重要事实得到佐证。

出身萨摩藩的重野安绎（1827-1910）在幕末的最高学府江户昌平黉求学时便已崭露头角，被誉为“天下的才子”。后来在大阪开设私塾成德书院时翻译了《万国公法》，收了弟子岩崎弥之助，即三菱商社创始人弥太郎的弟弟和第二代社长。在明治时期先时是担任政府修史馆负责人，后为东京大学教授，1889年与兰克的弟子路德维希·里斯教授一起创立史学会并任会长，提倡实证史学。翌年，他在东京学士会院发表题为《学问终究归于考证》的演讲提纲中列举详细书目，证实有两百年历史的中国考证学和一百年历史的日本考证学早于五十年前才兴起的西方考证学。精于中日两国学术史的重野还认为，阮元关于“明季学者空论性命而不务实学”的论断有失偏颇，指出此倾向实际上始于唐代，而徐光启等明代学者因受到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带来的西学影响，在天文历法和农政水利等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907年5月在代表帝国学士院参加在维也纳举行的万国学士院联合会第三次总会，以书面形式发表了《大日本历史略说》及委托归化英人翻译的英文版。会后取道西伯利亚铁路来中国，在武昌拜会张之洞时建议中国的翰林院加入万国学士院联合会，得到张的首肯。此情景被陪同重野的西村亲眼目睹，且西村在1897年底便拜会过张，其建言《联交私议》深得张的重视，以致亲自书写条幅以谢西村。在得知王先谦的《日本源流考》因缺乏明治维新相关资料而无法完成该书的近代部分后，重野作为善邻译书馆的负责人伸出援手，迅速编就《大日本维新史》相赠。他本人亲历明治维新，有许多讲稿和文章，曾主持过官修《大日本编年史》，1894年至1906年在岩崎弥之助的静嘉堂文库内设立“野史亭”编修《国史综览稿》，岩崎还为其编修人员提供薪资和经费，所以根据一手史料汇编《大日本维新史》可谓易如反掌。

内藤湖南（1866-1934）出身于书香门第，少年时便有神童之称。在秋田师范学校求学时爱读《舆地志略》和《万国史》，二十岁时担任小学首席训导时的诗作《读史有感》中有“看来世上言论毒，未必秦皇是暴君”两句。两年后离职上东京跟随英美人士学习英语，担任报社记者，参加多个社团活动，广泛搜购古籍西书，夜读至凌晨四时然后入眠，这些习惯终身不改。1896年在大阪朝日新闻连载《关西文运论》达半年之久，次年将其编成《近世文学史论》出版后，作为兼通儒学，佛学和国学的新秀一举成名，之后担任台湾日报记者一年。1899年初次访华，与严复，张元济，罗振玉等一流学者深入交流，收获甚丰，从此立志研究东洋史和中国学。1902年春，内藤就今后的职业规划广泛咨询友人意见并加以深思熟虑后，在信中告诉父亲，“孩儿之生涯，自信最终会成为东洋历史的大学教授，且以中国问题研究而自成一派。今后的目的是将史学研究成果发表于欧罗巴之学术中心，作为世界级的学者之一人而名传后世（不限于日本），而作为亚洲级的学者，自觉业已部分成功了。”五年后的1907年，湖南就任京都帝国大学讲师，两年后升任教授。从他的后半生来看，此番预言几乎全部应验。例如，他和法国汉学大家保罗·伯希和的相互敬重关系，可以由以下事实得到佐证。伯希和在1924年访欧时邀请他自己家里拍摄珍藏的敦煌文书，1926年为《内藤博士还历祝贺 支那学论丛》供稿，1935年来日参访并参加内藤一周年忌辰，在顺访内藤的别墅恭仁山庄内的书库后题词，“谨此纪念我朝贡般地来访内藤教授的图书馆”。其钢笔字迹严重褪色几近无法辨认，幸而被我发现得以保存下来。

内藤与章学诚《文史通义》的邂逅,就是在做出上述预言半年之后的1902年秋第二次游历中国时到访的杭州书肆,而且很可能得到了前此在北京与之长谈达半日之久的沈曾植的提点。关西大学图书馆保存的内藤手泽本《文史通义》中有不少他当年用红笔写下的评语。内藤在初次访华后便深信“东西之学术,方集注于我邦,荟萃之,折中之,融和之,而开学术之生面,形成世界文明之一大转机,地位无有较我邦善者矣。”“支那学风虽不免有固陋之处,亦有与欧西神理相似者,故通欧西学术变迁之大体者,更讲究汉学,若不误门径,对照其异同,且便于记忆,又资于发明,其效果绝非些小也。”正如其高足贝冢茂树对师说的回忆,内藤认为章学诚的学术类似西方的社会学,且因章在乾嘉时期重经轻史埋头考据的风潮中特立独行,主张六经皆史,志在经世济民,故对章氏推崇备至。但是他并不轻易下笔,持续收集相关资料,直到1919年从上海的日籍乐善堂书药房购得孙廷翰(1861-1918)的钞本《章氏遗书》十八册后,才执笔撰写了《章实斋先生年谱》。

2023年我在吾妻重二,永田知之二位合编的《中国学的近代性展开与日中交涉》中撰文指出了内藤的章学诚推崇与富永仲基(1815-1846)推崇是相辅相成的。富永出身于大阪富商之家,其父参与筹建大阪的怀德堂书院(1724-1869)并提供自己的养老宅邸作为校舍。因为运用“加法”研究佛教典籍发展史而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于富永的天才和慧眼,内藤早在《近世文学史论》中已经给予高度评价。三十年后,富永分析神儒佛三教异同并提倡“诚之道”的佚著《翁之文》在1924年被发现后,内藤自费加以刊印,并在纪念会上做了如下评价——“通过自身摸索构建出具有逻辑性的研究方法的基础,并且凭借此极为正确的基础构建自身的开究方法,这样的日本人极其稀少。伊藤仁斋、荻生徂徕均为相当卓越之人,但在研究学问的日本人当中,能够在逻辑基础之上构建研究方法的学者,可谓仅有富永仲基一人而已。这点让我们深感敬佩。”内藤如此重视研究方法的逻辑性,是与他非常佩服并与之过从甚密的哲学家三宅雪岭(1860-1945)分不开的。东京大学出身的三宅虽然只比他大六岁,早在1890年就出版了《逻辑学》一书。而正是在这一年底,内藤加入三宅等创立的政教社并担任他的写手,不久就由三宅口授内藤笔录而成就了名著《真善美日本人》。而内藤的成名作《近世文学史论》在1897年出版时也是由三宅作序推荐的。换言之,两人在欧美文化强势涌入日本的明治中期,既虚心向化但绝不自信形秽,在保持文化主体性这一点上,其态度与重野安绎是完全一致的。重野曾经指出,“盖我邦国体,取他善,聚众美,是以成立。国初以来,资于汉学而建教化政法,近年又采用洋学更张诸事业。”但“汉学之实用,于我邦终无尽期,从今以后,必成尤为着实之用具”。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每年从国学、汉学和洋等三个领域各选一位权威学者在新年伊始之际为天皇进讲,这一惯例于1926年正式成为宫中仪式(自1953年起改为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个领域)。重野安绎在1905,1907,1908和1909这四年为明治天皇分别讲解了《诗经》《尚书》《中庸》《易经》中的有关篇章。内藤湖南在1931年为昭和天皇讲解杜佑《通典》时指出,杜佑在研究经书所载礼俗时,曾将之与当时四夷的礼俗做过比较,其做法与近来法国汉学家最新的民俗学研究方法如出一辙。所以,今天我们考察近代中国与欧美、日本之间的史学互动时,需要把

握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物、书籍和事情的基本情况及其背景,运用文化交涉学的方法加以考察,才能做出中肯的评价。



图1 重野《大日本维新史》凡例, 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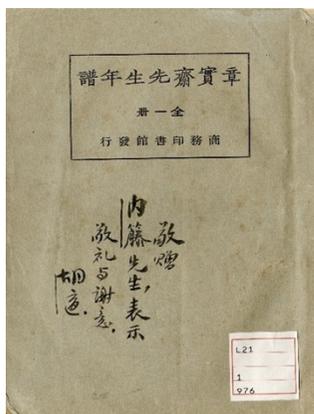


图2 胡适寄赠内藤的《章实斋先生年谱》关西大学图书馆内藤文库藏



图3 1935年6月23日伯希和来访内藤故居恭仁山庄时的纪念合影(安藤德器《西園寺公と湖南先生》、言海書房1936年)左起 伯希和, 内藤乾吉(前), 石滨纯太郎(后), 内藤遗孀田口郁子, 羽田亨, 石田干之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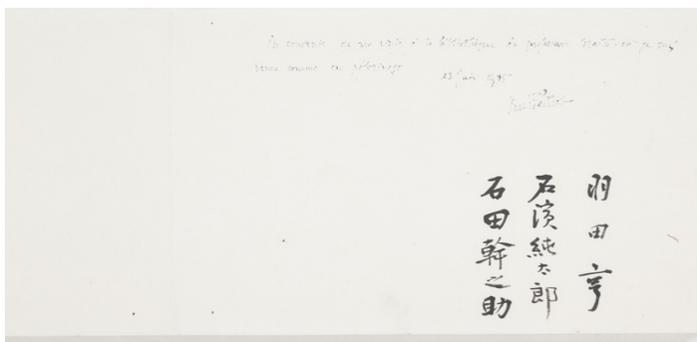


图4 1935年6月23日伯希和等来访时的签名留言, 其钢笔字迹依稀可见。两天后参加内藤的一周忌法事。出典同图2